

# 从救济到启蒙:论中国共产党与战时上海难民工作的转向

刘超<sup>1</sup>, 刘禹卓<sup>2</sup>

(1.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2. 大连市民政局 区划地名处, 辽宁 大连 116022)

**摘要:** 全面抗战爆发后, 上海的战事起伏和社会动荡造成了严重的难民潮, 继之而来的则是庞杂的组织与管理工作。面对空前的挑战, 国民政府、社会团体与中国共产党都进行了各自的应对并形成了三种道路: 国民政府前期准备不足导致难民救济系统迟迟未能建立起来的困境。社会团体通过“改良”已有框架建立起难民教育体系, 系统规划和发展生产教育、文化教育, 取得了可喜成绩, 但仍有明显限度。而后, 为克服自身理论水平和组织能力的不足, 社会团体积极寻求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中国共产党不仅创造性地完成了对难民的救济和教育, 而且实现了对难民的思想启蒙和政治动员, 使之由社会的负担变为能动的革命力量。在此进程中, 上海难民工作发生了由“救济”到“启蒙”的转向, 其内涵也不断拓展。中国共产党不仅很好地完成了难民工作, 而且强有力地推动了上海乃至华东地区抗战事业的开展。

**关键词:** 全面抗战; 中国共产党; 难民教育; 思想启蒙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志码: A

## From Relief to Enlightenmen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hift of Refugee Work in Shanghai During the Comprehensive Total Resistance

LIU Chao<sup>1</sup>, LIU Yuzhuo<sup>2</sup>

(1.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58, China; 2. Department of Division Place Name, Dalian Civil Affairs Bureau, Dalian Liaoning 116022,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Total Resistance, the ups and downs of war and social unrest in Shanghai caused a serious wave of refugees, followed by a complex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work. In the face of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social groups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arried out their own responses and formed three paths: The lack of preparation of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led to the delay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fugee relief system. Social groups established a refugee education system through improving the existing framework, systematically planned and developed production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ducation, and

收稿日期: 2025-09-02

基金项目: 2024年度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计划”项目(项目编号: 2024LTQN602)。

作者简介: 刘超(1982-), 男,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 中国近代史、跨国史、高等教育。邮箱: lcpku@126.com  
刘禹卓(1998-), 女, 硕士。研究方向: 中共党史、教育史。

achieved gratifying resul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obvious limits. Thereafter,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their own theoretical level and organizational ability, social groups actively sought cooperation with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ot only creatively completed the relief and education of refugees, but also realized the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f refugees, transforming them from social burdens to dynamic revolutionary forces. In this process, Shanghai refugee work has undergone a shift from "relief" to "enlightenment", and its connota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expand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ot only completed the refugee work brilliantly, but also strong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tal Resistance in Shanghai and even East China.

**Key words:** Total Resistanc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fugee education;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 引言

受社会动荡、战事频发等因素影响,和其他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样,难民现象在近代中国甚为常见。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成为难民涌入的重要地区,难民问题及其救济工作成为战时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1937—1942年间难民规模和概况,以及各政治力量、社会团体对难民救济政策措施的探讨上。这一时期,上海难民工作呈现出多主体、网络化的特征。国民政府通过建立机构和出台政策等措施试图统筹难民救济工作,但其实际控制力随着战事西移而衰弱<sup>[1]</sup>。社会救济团体如上海国际救济会、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慈联会等,在难民营救、收容、卫生、教育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sup>[2-8]</sup>。中国共产党则通过统战工作,逐步掌握慈联会等难民救济机构的实际领导权,在难民中发展组织、培养干部、输送人员参加新四军,实现了社会救济与革命动员的双重目标<sup>[9-10]</sup>。其中,关于难民教育的论述主要从文化、思想和生产教育三方面简单展开,对难民教育改革中遭遇的现实困境、推动动力及其意义缺乏深层次阐释或稍显片面<sup>[11]</sup>。总体来看,针对上海难民教育的研究体系不明、深度不够,未能统揽难民工作全局和社会背景进行综合分析。

拟重返历史现场,重审上述议题,深度探讨此间上海难民工作(特别是难民教育问题)发展的挑

战、动力、内在逻辑和成效,挖掘其中的思想意涵和政治意义,进而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难民教育中的理论构建、组织策略与长效影响。其核心问题是:当时上海难民工作的开展脉络如何?相关各方对难民工作的总体思路及政策措施有何差异?其中领导权的演化轨迹如何?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应对现实难局中脱颖而出,成为上海难民工作的实际掌舵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难民工作的全局产生了什么影响?

## 一、全面抗战时期上海难民工作的演变

上海难民工作是在政治环境日趋险恶、难民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民族危机的严峻形势、救济体系及常规教育系统的无力,促使上海难民工作的改革成为一项紧迫而极具挑战性的重要任务。

### (一) 难民危机与国民政府的应对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附近聚集的难民高达130万人以上,涌入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中国难民高峰时达70万人以上,几乎接近租界内原有人口规模(约100万)<sup>[12-13]</sup>。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难民数量增长越来越快,即使经过迭次遣送,全市收容难民人数仍长期保持在14万左右。据上海国际救济会调查,上海难民在1937年11月达19.4万人(另有调查数据为25万左右),12月达21.1万人(另有《时报》调查数据为25万左右<sup>[14]</sup>),1938年1月达23.3万人<sup>[15]</sup>,至1938年

10月,在沪难民仍多达12万人<sup>[16]</sup>。难民群体成分复杂,且经济能力低弱、教育程度浅薄、谋生技能匮乏,其中的老弱妇孺几乎占总体的3/4,而壮丁只占小部分<sup>[17]</sup>。若放任难民无序流动,不仅会对社会秩序甚至抗战形势造成极大威胁,还将直接造成社会劳动力和革命力量的浪费。如何迅速而有效地解决难民问题,已成为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针对严峻的形势,国民政府调整了救济机构,制定了各项难民救济办法。

国民政府主持下的难民救济工作仅持续了三个月(1937年8月到11月中旬)。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根据形势需要对难民救济机关进行了二次调整:由早期应对灾荒的赈务委员会改组为上海市救济委员会(1937年8月9日),之后又改组为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上海分会(1937年10月1日)。两次机构调整均源于全面抗战爆发后难民规模空前、结构复杂,原有的管理机构不再适应战局的发展,因而设立专司战时难民救济事务的机构。

虽然改组后的难民救济机关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分散力量,但其仅承担协调责任,实际工作主要依靠慈联会战区难民委员会、国际救济组织(红十字会等)及同乡会等社会力量。且其工作内容主要限于紧急救济(包括难民抢救、输送和收容等),对难民的组织和训练还停留在自发探索阶段,并不为国民政府高层人士所重视。少数自办或合办的难民教育活动组织松散,覆盖面不够广泛且内容较单一,因而效果难以保证。直至1937年11月中旬,国民政府主导的救济工作结束,也未能在制度层面建立起包括难民救济政策的战时体制。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阻碍:

一是救济理念落后。难民救济机关的多次调整,反映出国民政府对难民工作紧迫性和复杂性的认识有所深化,但仍未引起足够重视,导致组织上准备不足。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著名社会教育家李公朴就曾批评当局将难民救济事业视作临时应付的工作,缺乏全盘规划,“将难民看作一种战时国家的重累,忽视了这广大的人民,原是生产的人民,在战时……仍然是国家生产上的一种生产力”<sup>[18]</sup>。

二是管理不力。国民政府主导的救济机关主要

以协调为主,对社会团体间各自为政的现象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且经费和人员匮乏、官僚化腐败化等问题也颇为严重,导致救济工作秩序混乱、流弊丛生。随着难民工作的推进,国民政府也逐渐意识到了协调机制的弊端,至1938年4月27日南京改组成立赈济委员会,就摒弃了单纯的协调机制,对难民工作实行直接管理。

三是组织和发动群众能力不足。国民政府“诚恐团体众多,组织散漫”,因而“一刀切”地合并、取缔难民机构<sup>[19]</sup>。这不仅严重限制了救亡团体发展,也阻碍了民众参与抗日。此外,国民政府因自身的局限性,无法洞察广大难民群体的抗战潜力,导致难民工作的救济属性远胜于教育属性,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难民组织训练,就存在覆盖面不够、思想教育宣传不到位等问题,未能达到应有的效果<sup>[20]</sup>。

国民政府难以构建完备的难民管理体系以支持更深入的难民工作,故其相关工作也存在诸多局限。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此时仍无战略眼光,无法认识到在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无教育的救济是消极的,其投入也将是无限的,如此组织民众无异于缘木求鱼。上海社会团体内的先进知识分子和中共上海党组织深刻反思了国民党在组织和教育民众方面的不足,并在此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发动一切有生力量进入收容所服务,充实了难民救济与教育力量。

## (二) 社会团体与难民教育的创造性开展

1937年11月中旬,国民政府的救济机关撤出上海,难民救济的压力完全转嫁到了社会团体身上。在经历一系列理念之争与实践探索后,上海难民教育发展形成相对健全的组织体系,难民工作逐渐脱离消极救济的窠臼,呈现出一定的发展性和教育性。

事实上,上海难民教育在成立之初着实经历了一番论争。时人即觉得,“在这孤岛上,举办这簇新得(的)事业”遭遇种种困难:一无“西洋各国可做楷模”,二无国内“已往成例可援”,这是理论层面的迷茫。此外,“没有经验过的教师、没有较合适的教材、没有多余下的经费,尤其是在收容所里没有教室,没有桌椅……一切都没有,有的只是



成千成万需要教育的难民”；原有教育机关几乎损失殆尽<sup>[21]</sup>，新建难民收容所连基本的饮食和卫生条件都无法提供，更遑论教育训练，客观条件的限制可见一斑，成为开展难民教育最大的阻力<sup>[22]</sup>。主观层面，初期收容所本身组织教育的积极性也不高，管理者受传统慈善理念的影响，“以为难民只要给养不缺乏，已算尽其收容的能事，教育何必多问<sup>[23]</sup>！”总之，从理论到实践的诸多问题阻碍了早期难民教育的发展，但是知识界人士并未因此放弃对难民教育的探索。

文教界人士从维持租界秩序的即时效用和民族发展的长远社会效益出发，阐述难民教育势在必行的观点。如时任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后被聘为上海难民教育委员会主席的陈鹤琴就撰文提出，难民教育一为生存，二为革命。他将难民教育与民众生计及民族危亡紧密联系在一起<sup>[24-25]</sup>。时任国立暨南大学教育学教授陈科美也撰文论述难民教育在维持租界秩序，指导难民思想和行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sup>[26]</sup>。学者奚均初更是将难民教育提升到“百年大计”的地位上<sup>[27]</sup>。难民教育一时成了上海文教界讨论的焦点，有的报刊还发行了难民教育专刊进行集中讨论。知识分子开始尝试将难民教育向社会推广，推动这一工作真正落地。

当时，上海难民救济团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难民教育彻底改革。其中，代表性人物张宗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提出，战时应另行建立教育机构，在“抗战”的总原则下制定战时教育方案<sup>[28]</sup>。主席委员陈鹤琴力主对现有学校教育进行系统性结构性改革，应着眼于民族现实及未来的需要（即“服务于革命”），对难民教育的组织形式、内容和方法等诸多方面进行彻底革新<sup>[24]</sup>。许多普通教员也普遍支持实施持久抗战生活背景下的难民教育，旨在“培植抗战民力”<sup>[29]</sup>。全国范围内蔚然成风的战时教育思潮、上海各界对难民教育的深入讨论，都为后来上海难民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创造性转化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理念向实践的转化离不开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组织平台，因此建立专门的难民教育机构被提上日程。从1937年到1942年，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等各救济团体先后通过集中劝募和

统一供给等方式为难民教育募集经费。1937年11月，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邀集陈鹤琴、刘湛恩、郑西谷等教育专家组成教育委员会（公推陈鹤琴为主席），对上海各收容所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确定了三大教育方向，即儿童教育、成人教育和生产教育。针对各难民收容所在教育管理中存在的目标不明、组织散乱等问题，教育委员会领导建立了联结各救济团体的人事网络，采用协同管理机制和调查协商策略，推动难民教育标准化、统一化。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文教界人士及中国共产党、国际同仁的共同推动下，上海难民教育逐渐发展出相对健全的组织体系。教育委员会针对儿童、成人和有职业技能学习需求的人群，开设了不同的课程，并采取专项领导的方式，大力提升教育实效。由此，上海难民教育得到了系统规划，在单纯的训导外加入了生产教育和文化教育的内容，组织化、系统化的难民教育逐渐酝酿成形。

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知识分子基于对现实困境的体认，进行了积极尝试并探索出了战时难民教育更多的可能性。然而，随着实践的深入，他们也越发意识到自身在思想和组织等方面的局限性，尤其痛感缺乏与劳苦大众打交道的经验，难以真正扎根到难民之中，许多工作只能浮于表面。他们越发迫切地需要理论上的指引和组织上的协助，充分提高对工人的动员能力，充实军政运作、革命斗争的经验。在此情势下，潜伏多年的中国共产党顺势而为，走向前台，利用自身理论与组织优势，及时、深入地介入难民工作。

### （三）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与难民工作的政治转向

“八·一三”事变后，时任中共上海党组织领导人的刘晓立即召集干部讨论“我们党在这种战乱的环境中应当做什么”等问题<sup>[30]</sup>。上海党组织一致认为：难民是救济对象，也是革命力量，各系统应集中力量在难民中训练一批干部，以备充实到其他系统的骨干队伍中<sup>[31]</sup>。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重新建立，仅一个月之后就成立了难民工作委员会（简称“难委”），果断决定“要特别集中力量于难民工作”，把它视为“地下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孤岛时期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将上海众多的难民收

容所作为党的重要工作阵地。1938年2月,难委成立党团,朱启銓任书记,焦明、周克为委员。难委党团通过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成立上海难民教育委员会,全面领导慈联会、上海国际救济会等救济机构的难民工作。

当时,江苏省委不仅关注着上海市区、租界的难民救助工作,更创造性地要求把难民安置、教育、疏散工作与武装民众、开辟敌后农村武装游击战任务有机结合起来。省委将上海市内百名党员中的三成骨干都安排到各难民收容所中,其中,既有党中央派来的张爱萍、余立金等人,又有陈国栋、韩念龙、刘述周等一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还有国共合作后从国民党监狱里保释出来的一批同志。这些同志以管理者、教员或难民的身份活动,进一步增大了难民收容所的领导力量。其中,慈联会的五十几个收容所中有二十几个所建立了党支部,先后服务难民五十万人次,在当时被誉为“小延安”<sup>[32]</sup>。这一时期,党的难民工作主要包含以下几项:

一是开展上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包括慈联会、上海国际救济会、租界当局和社会上层人士,以“节约救难”口号动员各界为难民募捐,筹办难民教育,开展难胞生产自救等,逐渐掌握了慈联会、上海国际救济会下辖的大部分难民收容所的实际管理权。当时难民救济工作的重要人物赵朴初与难民教育负责人陈鹤琴一样皆为党的统战对象,焦明、吴大琨、许幸之、许晴、刘平若、朱启銓等多位地下党员都曾作为助手辅助二人工作。赵朴初亦坦言“用人主要靠焦明”<sup>[33]</sup>。正是在中共与知识分子的持续且深入的合作中,双方形成了思想共鸣,共同推动难民工作为抗战服务。这一工作的开展也意味着中共白区工作政策的重要转变,是全党在总结八七会议以来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反思其中存在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的基础上,提出新阶段白区工作基本方针的生动体现<sup>[34-37]</sup>。

二是在进步的难民工作者和难胞中发展党员,建立和扩大党的组织。从1938年到1941年,累计发展党员390余人。

三是对难民进行抗日教育和阶级教育,激发其抗日热情和阶级觉悟。通过创办难童学校、职业学

校等,帮助难民学习文化和技术。这一时期,逐渐掌握了难民工作实际领导权的中国共产党,充分展示其组织优势,以思想教育为统领,将难民教育与社会生产、抗战生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促成了广大难民的思想觉醒和革命化转变,难民教育进入了新的转型时期。

四是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动员收容所和社会各界青壮年到前线支援抗日斗争,有些青壮年积极分子则到近郊各县及沪宁线一带游击区参加武装斗争,或去工厂、企业,开拓党的基层工作。难民收容所成为上海党组织储备、培育和输送人才的一个重要基地。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难民教育的转型发展

在中共江苏难委的推进下,各收容所根据文化程度,成立识字班、文化班,将难民的生产教育与政治理论学习相结合,以思想教育统领生产和文化教育,难民教育的意义不再局限于普及文化知识,而更在于唤醒其作为独立主体的自觉,为积蓄抗战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 (一) 文化教育的开展

在整个难民教育中,文化教育为基础。它对生产教育和思想教育的实施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据统计,上海的难民中工农阶级达九成,文盲居多。因此对超九成的成人进行扫盲就成为难民教育的重点之一<sup>[38]</sup>。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协助下,难民教育工作者因地制宜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识字教育为抓手,形成了以识字班为基础、以新文字为辅助工具、以“一刻教育”为识字环境的扫盲系统,有效地提升了难民的文化水平。

在当时,识字教育的基础是系统的识字班。所内依照难民职业、性别、年龄等方面的差异划分识字班,例如有的收容所设置了青年教育班、儿童教育班、妇女识字班等。为了提升教学效率,各所选拔出成绩较为优良的学生担任“小先生”或“大先生”,协助教师对程度不同的成人进行讲授<sup>[39]</sup>。识字教育在难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逐渐提升,上海国际红十字会主办时期,各所难民接受识字教育主要采取自愿参与的原则;及至上海难民救济协会主办

时期,识字教育更受重视,协会实施强迫办法,要求26岁以上、40岁以下的成人难民均须接受4个月的识字教育。在政策推动下,各所成人识字教育规模不断增加,由40班增至74班,受教的成年男女达六千三百余人<sup>[40]</sup>。识字教育的保障措施也更加完善,各所全体管教工作人员都被纳入成人识字教育推进团,参与每日的教授活动,还组织了小先生识字推进队,承担指导成人识字写字阅读书报等工作<sup>[41]</sup>。

然而,教育工作者发现,学习汉字的复杂性与难民教育本身的经济性要求(省钱、省时、通俗)相悖。在此困境下,中共上海党组织主动通过上海新文字研究会联系难民教育的主持人陈鹤琴,向其系统介绍新文字。经过教学比较实验验证,新文字被确认为最有效的扫盲辅助工具。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救济月刊》详细记录了在难民收容所中推广新文字的过程,从1938年5月起,在各所中有计划、大规模地推广新文字。一方面,改进新文字教学,包括师资配备、教材建设、教学方法改革三方面;另一方面,争取舆论支持,通过建立团体、出版书刊、举行会议和展览、争取社会名流支持、实际应用等多种方式推行新文字。陈望道、韦恂等中共党员还与陈鹤琴等进步知识分子一同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和上海语文教育学会,以学会为依托进行新文字研究,与地下党合办《语文周刊》宣传新文字<sup>[42]</sup>。为了扩大影响力,教育委员会采用抓典型示范、发表主题演讲和召开成果展览等方式,向国内外政、商、文教界人士展示新文字的教学成效<sup>[43-44]</sup>。上海难民的新文字教育取得了突出成绩,在当时受到国内外的共同关注,还成为战后推广新文字的实践基础。陈鹤琴通过亲身参加中共领导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和普及教育实践,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关心人民,重视普及教育扫除文盲”。1939年下半年,难民收容所中难民渐少,陈鹤琴、陈选善等联合地下党发起成立上海市成人义务教育促进会,继续演讲并教授新文字<sup>[45]</sup>。

在正式课程之外,上海难民救济协会还通过“一刻教育”营造汉字学习的氛围,在“全所即学校、大众即学生、职员即导师、儿童即助手、生活即教育、三字即课文”的原则下施教,提升了识字

教育的实效。“一刻教育”选材贴近实际生活,教学法符合学习心理,意在灌输日常常识、注重应用。日积月累之下,难民收容所成了扫盲的基地,也在识字教育过程中增强了难民的民族思想与科学素养。

## (二) 生产教育的加强

对难民施行生产教育的必要性毋庸置疑,它既可激发难民内生力量以免穷尽之虞,又可保障其生存发展和社会稳定。生产自救也是中共关注的工作重点。1938年至1942年,中国共产党联合社会团体和工商界力量,着力提升各收容所生产训练的规模和质量,变消极救济为积极救济,使流浪无着的难民成为抗战建国的战士和自力更生的新民,成效极为卓著。

1938年初至1939年初的一年中,在中共的推进下,上海难民开展木具、工场、编织、印刷、缝纫等生产自救活动,参加生产自救的难民(包括成人和中等教育水平的难童)达8000余人,生产60余种产品。这一时期,虽然收容所的生产教育仍存在覆盖面窄、内容结构失衡的问题,但也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实施路径,即遵循设备少、易速成、强度适宜的原则,选择举办销售广、获利易的日用品项目。但这也造成了难民基本只能进入低技术门槛工作的窘境。1939年后,生产教育进入大规模推广的阶段,被列为救济事业之亟务,教育培训的内容也大大丰富。根据1939年3月上海难民救济协会发布的《难民生产教育计划大纲草案》,当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生产教育不仅包括基础性的训练项目,还增设了个别对专业性要求较高的训练班,包括无线电收发和中英文打字训练班。组织机构还在求职方面提供必要帮助,针对职业素质进行专门培训,甚至创办了一批工厂以提供实训机会。总之,1938年至1942年,上海难民生产教育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推广过程,使许多难民获得了谋生技能,“成为自食其力之生产者”<sup>[46]</sup>。

在与先进知识分子共同推进生产教育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站在更高的基点上,反思难民生产教育的根本问题:生产教育的根本目的到底是制造一批廉价劳动力,还是在思想上真正解放劳动者?显然,掌握了谋生技能的难民如果不能团结起来,为



民族利益和工人阶级自身的合法权益而斗争,最终仍将可能沦为工业发展的廉价劳动力,而无法成为支持革命和抗日救亡的积极力量。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这一问题,江苏省委建立职业委员会,顾准、陆至仁等相关负责人决定从业余补习学校入手解决职业青年政治学习的迫切需要。例如,中共党员共同创立的神州职业夜中学面向难民中的职业青年开设了中学班、补习班、职业班和学术讲座四种班型,其中以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概论和音乐为主要内容的学术讲座有效提升了学员的政治素养。上海第一批输送到皖南新四军去的青年即是该校学生。无线电收发班的两期学生毕业后,也都输送到新四军<sup>[47]</sup>。此间,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办起的“现代知识讲座”培养了大批革命人士,被誉为“上海抗大”<sup>[48]</sup>。中国共产党团结职业青年,以补习学校为阵地,在斗争中培养工人干部,促进工人觉醒,使他们自己主动组织起来,去争取政治和经济地位。

### (三) 思想教育的深化

如果说文化教育使难民拥有智识,生产教育使难民具备自力更生的技能,那么思想教育就是武装其大脑以抵御敌人的思想控制、动员难民投身抗战的有力武器。此间,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两所集中培养优秀难童的学校,引导一大批优秀青少年接受政治思想教育,走上革命道路。其中包括1938年10月成立的工华难童收容所,难委成员丁瑜任所长,先后有11~15岁约1000名难童入校学习;以及1939年2月创办的慈联职业中学,由职协党团成员、神州职业夜校校长许德良兼任校长,有近3000名15~20岁青少年入学。同时,中共着力推动各难民收容所的抗日教育和阶级教育宣传,将上海难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文化教育、生产教育及生活管理等各个环节之中<sup>[37]</sup>。其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培养集体意识,进行自我教育和民众动员。马昌实提出,真正的战时教育应注重在集体生活中,难民参与难民收容所的行政事务即最好的民治教育<sup>[49]</sup>。陈汝惠专文讨论了难民的德育和群育问题。他在强调组织训练、爱国主义教育、科学教育及养成良好习惯的基础上,提出应通过大扫除、

疾病看护、生活座谈会、新文字研究班等途径,给难民提供合作互助机会,提升难民的道德水平。对于难民这一经历特殊的群体,为其提供必要的思想疏导和精神支持是确保其适应社会的基础。在有党组织的难民所内,组织各种娱乐活动,召开时事座谈会、报告演讲会,坚定抗战信念。为了便于组织,收容所对4至6岁婴幼儿、6至16岁难童以及16岁至60岁男性或女性难民、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分别管理。党员带头成立姊妹会、兄弟会,并尽量以难民熟悉的话语方式进行沟通,使难民感觉到被尊重、被接纳、被理解,从而产生深切的认同感,更加配合管理并积极寻找出路。难民收容所的集体活动还包括训练班、读书会、道德常识讲演、电影放映会等,各类活动均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贴近难民生活实际,注重传播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如1938年3月间,上海国际救济会聘专员分赴六十所进行240次道德演讲,主题包括自助、品格、责任、节俭、互助、勇敢、公益、诚实等,每次时间一至两小时不等;另与电影教育社合作,至三十一所播放电影,影片与生产、常识相关。在党的组织和引导下,难民的精神面貌在各种集体活动中得到了显著改观。

第二,进行民族意识教育,激发爱国情怀。中共党组织借助新文字读物《中国历史故事》丛书(岳飞、花木兰、文天祥、郑成功等的历史故事,围绕“民族振兴”的论题,与难民进行讨论,指导国民为人处世、抗战建国。在日寇势力全面侵入租界前夕,陈望道联合陈鹤琴发起筹办中国语文展览会,通过会上陈列的汉字改革和拉丁化新文字的材料以及新文字读写和电讯表演,对上海人民进行了“最后一课”的爱国主义教育<sup>[45]</sup>。针对已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难民青年,难委还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培养计划。首先,开展了一系列读书会,组织党内外青年共读《西行漫记》《论持久战》《帝国主义》《国难记》等重要作品,引导进步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其次,党员组织进步青年从公开刊物如《救亡日报》《立报》,以及党内刊物《真理》和《党的生活》中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理论,增进难民中积极分子对国情世情的感知以及对中共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的理解<sup>[37]</sup>。

第三,培养革命意志,激发抗战热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慈联会根据抗战生活背景,重新编订了战时教育课本,包括战时儿童初级课本、战时妇女课本、战时壮丁读本等。其中,战时儿童初级课本包括《中国人》《东洋兵》《男人和女人》《小孩救国》等内容,战时妇女课本在战时儿童初级课本之外增加了《可恶的日本兵》《难民》等篇目,战时壮丁读本则包含《难民的话》《智勇双全的左昆之》《同舟共济》《避飞机》《锯了腿的伤兵》等内容。在实际教学中,中共党员和知识分子引导难民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如在教“中国人”“小孩救国”等字时,引导难民思考“你们为什么会进难民收容所”“是谁害你们的”等问题;在妇女版教材中编入《难民的话》一文,说出千万难民的心声,“现在家也烧了,当的当光,卖的卖完,几天尝不到饭的味道,肚子饿得咕咕叫,最可怜的是小孩,跟着我们受冻饿,书也没有读……这都是东洋人害的<sup>[36]</sup>。”此外,各种有关抗日救亡的讲演、歌咏、舞剧、壁报等亦成为抗日宣传的主阵地。革命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抗战战歌》《热血》《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等)以及由戏曲界演员表演或难民自己排练演出的街头报剧(如《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任丹胡子》等),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难民的抗战信念和斗争意识<sup>[50]</sup>。

持续两年的难民教育,涌现出一大批积极分子,为党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难委以移民垦荒、遣送回乡的方法,为敌后抗日游击区、工厂、农村等输送有生力量。前后三批共运送1 200多名青年至新四军根据地,其中党员80余人。向苏中、苏南抗日游击区输送2 000余人。输送党员骨干近50人,到上海周边开拓抗日武装工作。派送40多名党员到宝山、吴淞等敌人占领下的市郊工作。另有40多名党员到工厂企业,开拓基层抗日工作。党组织的难民工作受到中共中央表扬,中央盛赞“这是上海地下党成功的壮举”<sup>[51]</sup>。

综上,中国共产党在资源有限、环境险恶的条件下,使难民工作突破“单纯救济”局限,实现对难民的思想启蒙和政治动员,并最终转向革命工作。由此,难民工作融入抗日救亡的洪流并成为其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实践不仅充实了“抗战中民生保障”的内涵,更是中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工作方法和价值立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具体体现,印证了中共在全面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 三、从救济到启蒙:上海难民工作政治转向探析

从1937年8月到1942年3月,抗战时期上海的难民工作历时四年多。根据现实条件和发展需要,难民工作的内涵经历了从“救济”到“启蒙”的嬗变,其背后是对革命教育缺失和危机应对不力的深刻检讨,是在战时教育思潮下对教育职能的重审和拓展,更是教育配合政治斗争的生动体现。在此过程中,不仅难民本身接受了全面的生产教育、文化教育和思想教育,曾身为教育者的广大民主人士也受到了切实的教育,许多共产党人也在此过程中日趋成熟。

#### (一) 走向启蒙:上海知识分子在难民教育中的精神觉醒与实践

可以说,在与中共合作的过程中,参与难民工作的众多社会民主人士对大众及战时教育也产生了全新的认知。首先,从事教育文化工作的民主人士此前往往将视野局限于学校教育的框架内,对社会教育的理解不够深入,与外界(特别是底层社会)的接触较少。经过难民工作的艰苦磨炼,他们放弃了在社会改造问题上的学院式、书斋式认知,将注意力重心转向社会实践或政治活动。其次,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开始告别个人主义,形成了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纪律性。当他们深切意识到仅靠个人的努力无法实现目标时,便主动寻求和接纳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参与,并与其达成广泛共识、紧密协作。再次,针对国民党政府的思想文化专制统治,知识分子开展了争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斗争。如陈鹤琴顶住国民政府的压力,推进新文字实验;赵朴初、刘湛恩等人则为中共举办社会政治讲座及培养革命人才提供了掩护。在与中共密切合作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了广泛共鸣,形成了三条主要的发展路径:其一是加入中共领导下的学委、工委、职委、近委等组织开展工作,抵



制日伪“以战养战”的阴谋。其二是赴皖南加入新四军。江苏省委难民工作委员会先后组织三批难民,动员了三千余人次上前线参加战斗,其中有革命战士,也有经过培训的无线电报务人才<sup>[52]</sup>。其三是赴江南游击区进行战地服务。他们中有校长、教授和学生,还有技术工人。他们到达苏南、苏中等地后或创办报刊、创建电台,或进入医院、兵工厂、印刷厂等工作,为根据地建设作出贡献<sup>[53]</sup>。

## (二) 道路探索: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难民工作中的领导实践与历史突破

除了对难民群体和知识分子的影响,中共本身也在组织难民工作的过程中实践和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累了党的基层工作经验,为革命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也实现了自身的进一步成熟。中共上海党组织通过全面贯彻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上层统战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工作方针,大大丰富了城市工作的经验,在国内外各界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增强了领导革命工作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此过程中,上海难民教育领导权很自然地在实际斗争中转移到了中国共产党手中。这在当时是时势所然,本质上则是党的领导权在社会救助和动员领域进行交替的缩影,集中体现了党通过组织建设、统一战线与制度创新,实现了领导权从局部到全局的拓展。

首先,阶级立场差异,决定救济的服务对象不同。国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其内在的阶级性导致其政策上更关注“有产者”的去留与技术人才的保存,对于广大底层难民的救助,更多是出于维持战时秩序、防止社会动荡的考量,而非彻底的启蒙、解放和赋能,缺乏使之实现阶级觉醒的意图;社会组织多由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组成,阶级立场具有“中间性”,他们既同情难民的苦难,希望通过“改良”改善民生,又缺乏彻底变革社会的革命意识,因此其救济局限于教育改良,无法唤醒阶级意识、从根本上推动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救济工作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在实践中,中共地下党有意识地在难民收容所开展组织工作和政治教育,将难民视为“革命的潜在力量”,而非“负担”,其救济行为带有鲜明的阶级意识和政治动员

色彩。

其次,组织逻辑差异,决定救济的实施效率不同。国民党实行官僚化管理,机构层级多、决策流程繁琐,且存在严重的腐败与资源挪用问题,导致前期救济系统迟迟未能建立。这本质上源于官僚体系的低效与脱离群众,使之无法快速适应危机环境、响应难民的迫切需求。社会组织本身是松散联盟,高度依赖外界捐款和志愿者,缺乏强制力和统一的指挥核心;且受限于“非政治性”定位,无法开展大规模、持续性的动员工作,因此其救济虽有成效,但难以突破“局部性、阶段性”的局限。中共依托地下党组织与群众团体,实行群众性、扁平化和网络化的组织方式,通过党支部直接对接难民所,依靠党员深入难民群体开展工作,决策快、执行强,能切实将救济与教育落到实处,体现“民主集中制”与“群众路线”的组织优势。

最后,战略目标差异,决定救济的长期导向不同。国民党战时战略目标是维护政权稳定、等待国际援助,难民工作仅作为应急措施,缺乏长期规划。社会组织的战略目标是通过渐进改良实现社会进步,缺乏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社会的革命目标。因此其难民教育仅聚焦文化知识与生产技能,无法引导难民认识到苦难的根源是阶级压迫与民族危机,也就难以实现难民的彻底解放。中共战时战略目标是发动全民族抗战、建立人民政权,难民工作是夯实革命基础、扩大群众队伍的长期战略的一部分,因此会通过教育与启蒙,将难民转化为支持革命、参与抗战的力量,为后续的革命事业积累资源。

值此非常之时,只有那种真正扎根基层的革命力量,才能深入底层、与广大民众休戚与共,唤醒难民的内在自觉和革命斗志。在当时的战争条件和艰难处境中,或许也只有眼光向下、长期深耕于底层社会并高度组织化的中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方能更好地认清形势、顺应现实,更好地调动各种有利因素深入难民、教育难民和组织难民,使难民更好地为抗战事业服务。至于思想观念和教育问题的真正解决,终究要面向社会政治问题,面向更广阔更复杂的社会世界;思想观念和教育也只有“在教育问题之外的社会问题解决中”<sup>[54]</sup>才能发挥

内在的能量。而这,无疑也意味着在革命战火中的相关各方都需要不断深入基层、不断在社会实践中进行自我革新和锤炼。世异时移,这段历史已然成为过去,中国的综合实力与国际处境也早已今非昔比,但上述历史背后所沉淀的经验和理念,却至今启人深思,益人心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相比其他任何组织而言,中国共产党都具有强大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能够团结带领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发有为,开拓事业发展的新局面。而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有效统筹经济建设(生产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组织建设,通过体系化的体制机制创新,在具体实践中将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共识和有效行动,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与组织保障。

#### 参考文献:

- [1] 余子道,张云道.八一三淞沪抗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2] 王春英.抗战时期难民收容所的设立及其特点[J].抗日战争研究,2004(3):201-220.
- [3] 丁倩.上海国际救济会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4.
- [4] 陆军.“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的上海国际救济会[J].档案春秋,2020(9):34-36.
- [5] 崔龙健.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6.
- [6] 杜成宪,黄书光.上海教育史第2卷1912-1949[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
- [7] 高嘉懋.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20.
- [8] 陶水木.“民为邦本,救难民即所以救国”:虞洽卿与上海难民救济协会[J].史林,2021(6):142-157.
- [9] 凌一览,陆晓路.抗战时期中共江苏省委的历史贡献[J].档案与建设,2007(6):33-38.
- [10] 李晓兰,黄亦君.“八一三”事变后中共在上海的难民工作[J].兰台世界,2009(5):58-59.
- [11] 张晓菲.上海难民救济研究(1937-1942)[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20.
- [12] 本市现有难民约七十万人左右[N].立报,1937-08-31.
- [13] 各团体遣送难民回籍[N].申报(上海版),1937-08-31.
- [14] 国际救济会设计组征求救济难民意见[N].时报(时报号外),1937-12-24.
- [15] 上海租界中的难民[N].新华日报,1938-03-01(2).
- [16] 救济难胞问题 希望孤岛有力同胞多多捐助[N].申报,1938-10-16.
- [17] 何清儒.战时难民教育[J].教育杂志,1938,28(1):39-43.
- [18] 李公朴.救济难民工作计划大纲[N].抗战(上海),1937(2):11.
- [19] 本市党政当局 拟统一抗敌团体 集中力量祛除流弊发挥抗敌效率 本市抗敌团体已达一百四十余个[N].立报,1937-08-13.
- [20] 秦孝仪.革命文献(第96辑)[M].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83.
- [21] 沪教育文化机关被敌摧残统计损失达一千余万元截止十五日止的调查报告[N].立报,1937-10-17.
- [22] 周龄前.关于难民教育意见一束[N].华美晨报,1938-02-20.
- [23] 王一方.难民的精神给养和难民教育[J].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8(34):1-2.
- [24] 陈鹤琴.非常时期的儿童教育[N].大公报(上海),1937-08-31.
- [25] 陈鹤琴昨在国际友谊社讲演本市难民教育问题 拟对各收容所难民施以相当教育期使难民出所后得以自立谋生[N].大美晚报晨刊,1938-01-06.
- [26] 陈科美.难民教育的几个基点[J].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8(32):1-4.
- [27] 奚均初.难民教育在现教育阶段上的地位[J].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8(34):5-6.
- [28] 张宗麟.战时教育的课程——生活教育社提出[J].抗战半月刊,1937(1):30-32.
- [29] 鲁弟.难民教育工作的多面观[J].妇女(上海1938),1938(1):9.
- [30] 陈修良.在党的诞生地重新建党——刘晓同志在1937年[N].解放日报,1991-06-28.
- [31]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32] 罗义俊.“八·一三”时期上海的难民工作[J].社会科学,1982(8):44-47.
- [33] 赵朴初.赵朴初文集(下)[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
- [34]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3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 [36] 张闻天选集编辑组.张闻天文集(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 [37]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38] 沪战发生以来救济经费已达二百万元 南市难民区日臻完善 饶神甫实为最大助力 李规庸报告救济状况[N].申报,1937-12-02.
- [39] 钱一鸣.参观难民救济协会第二难校 难胞得教养兼施受惠匪浅[N].申报,1939-11-04.
- [40] 救济协会教育组实施推进难民教育 强迫全体学龄儿童入学 铲除四十岁以下之文盲[N].申报,1939-02-10(10).
- [41] 难民协会推行成人识字教育[N].申报,1939-01-08(13).
- [42] 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
- [43] 陈鹤琴先生莅校演讲[J].文哲(上海1939),1939,1(1):8.
- [44] 新文字与难民教育[N].每日译报(难民问题特刊),1938-03-14.
- [45]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
- [46] 上海难民救济协会昨开成立大会·主席致辞[N].申报,1938-10-19(9).
- [47]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3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
- [48] 郭正洪.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 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49] 马昌实.难民教育问题[J].战时教育,1937(4).
- [50] 金立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抗日救亡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 [51]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上海人民与新四军[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
- [5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抗日风云录(下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53]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3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
- [54] 彭泽平,陆有铨.论当代中国教育学者的使命[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4):21-29.